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VERTRAUEN UND GEWALT

信任与暴力

试论现代一种特殊的局面

[德] 扬·菲利普·雷姆茨玛 著
赵蕾莲 译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VERTRAUEN UND GEWALT

信任与暴力

试论现代一种特殊的局面

[德] 扬·菲利普·雷姆茨玛 著
赵蕾莲 译

 商务印书馆
01 9-10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与暴力:试论现代一种特殊的局面/(德)雷姆茨玛著;赵蕾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097-5

I. ①信… II. ①雷… ②赵… III. ①暴力—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2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

信任与暴力
——试论现代一种特殊的局面

[德]扬·菲利普·雷姆茨玛 著
赵蕾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97-5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½

定价:56.00 元

前 言

9

这是社会科学的传统：一再追问现代这条特殊道路的条件和特殊性，而且分别视进行追问的理论家的偏好不同，确定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大概侧重合理性，侧重在功能上进行区分，无论侧重什么内容。本书的研究遵循这个研究传统，着力研究在作者看来被研究界忽略的一个主题：信任与暴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本书的研究着重探究三个问题：第一、现代这一特殊性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由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危机孕育而生的那个欧洲跨大西洋的文化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现代似乎把这个格局同所有其他的文化格局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与证明为合法这种特殊的需求区分开来，现代把使用暴力置于证明为合法这种需求之下。第二、在通往未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这条道路上，现代如何成功地把证明为合法这种需求以及现代的自我形象同其实际存在的暴力协调起来？第三、既然 20 世纪的暴力极端严重地触及现代的自我形象，那么它为什么却——首先——没有导致，人们耸耸肩地背离现代的特殊道路呢？

本研究既不想写成关于现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学，也不属于历史学专业。本研究使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尽管这部专著在阐释“信任”这个概念时必须独辟蹊径，因为，围绕这个概念进行的非常

有趣的社会学的讨论还在很大程度上互相矛盾。关于身体暴力的现象学和权力与暴力之间内在联系的主题,本研究得以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但我不能停滞不前,局限于此。本研究属于那种改变照明的工
10 作,就像把汽车的前灯重新对准一个已知的地带一样,并且按照这种方式突出原来处于黑暗中的那个地带,改变影子的投射等,这还表明,人们也可以用有别于以前习以为常的方法审视这个地带。因此,本研究并非同其他对现代的视角进行竞争,而是对现代视角进行补充。

本研究并非使用特殊的方法,而是使用一种描述技巧。大范围的概览同集中描写细节相互更迭,交相辉映。对细节的处理有必要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我选择了可以尽量清晰地展示我的分析意图的材料。细节部分试图补偿在概述中肯定太笼统的地方。本书作者的本行是语文学,所以,人们对作者的这种写作手法不会反感:通过语文学的分析,补充社会学的反思和历史学的具体事例材料,使二者相得益彰。读者同样对此不会见怪:作者提及并引用许多由汉堡社会研究所出版社出版的书。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与汉堡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才使本研究孕育而生。我感谢在该研究所内进行的多年讨论,而且,我的研究工作能取得进展,这还要归功于这些讨论。我要特别感谢在伯恩特·格莱纳领导下围绕“暴力理论与历史”这个研究领域进行的多次讨论。但是,不能不提的还有其他研究领域,“联邦德国的社会”(海因茨·布德主持)和“国家与社会”(乌尔里希·比勒费尔德主持)。我还要特别感谢蕾吉娜·米尔豪伊泽以及加比·茨伊普弗尔就性暴力问题同我进行的多次讨论,感谢沃尔夫冈·克劳斯哈尔同我对现代恐怖主义进行的讨论,感谢米歇尔·维尔德就暴力与公众舆论同我进行的讨论。我还要感谢马丁·鲍尔,他耗费心力地在本书最后编审工作结束之前通读了一遍书稿,他还向我指出了一系列需要说明

的段落。

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惊讶的是,我相当频繁地引用自己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因此我成为参考书目中被提及最多的作者。在此,我请求读者们相信我,这里并不涉及纯粹的孤芳自赏。该研究也是对我最近几年来曾经述之笔端的思想的概括总结:有时作为续写,有时作为修正,有时作为单纯的引用。因为本书的篇幅已经比计划超出很多,所以,我不可能像在过去几年的论文和报告中那样,详细论述。那些有意就个别主题进行深入研究者完全可以查阅本书中引用的文章。 11

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出版本书第一版的汉堡出版社:感谢汉堡出版社社长比尔吉特·奥特女士,她不仅向我提供了我在本研究中参考的许多书,而且还作为本书的审稿人对本书予以指导。我还要感谢约尔根·迪特曼以及汉纳斯·希克,他们的出版和经销工作使得本书在2008年春天首次出版后不久就得以出版一套平装本。

序言：谜团

13

“这怎么可能呢？”我母亲说。

——瓦尔特·坎姆普斯基^①，《塔德尔略泽和沃尔夫公司》

(*Tadellöser & Wolf*)

“我的作品后来或许压缩成足够著名的句子‘这怎么可能！’，而对一个人的一生而言，这已经够多，就好像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1990年3月5日，瓦尔特·坎姆普斯基在日记里这样写道^②。这个问题与苏格拉底的格言有很好的联系。然而，对这个著名问题的回答能有别于这部小说所做的，即按照指示的方式回答吗？

“我母亲说，‘现在这到底怎么可能呢，’‘我想，我们都牵扯进去了。’”^③

① 瓦尔特·坎姆普斯基(Walter Kempowski, 1929—)是德国作家，小说《塔德尔略泽和沃尔夫公司》叙述并反映了1933年到1945年的德国历史，被称为德国战后文学给人影响最深刻的作品之一。——译者注

② 坎姆普斯基：《哈密特》(*Hamit*)，第135页。

③ 坎姆普斯基：《塔德尔略泽和沃尔夫公司》(*Tadellöser & Wolf*)，第479页。

如同每部长篇小说一样，每篇历史编纂学的学术论文都有其自己的指示功能，没有哪一篇历史编纂学的学术论文能把握事件的错综复杂性，这在任何时期都适用，而且是老生常谈——尽管我们总得反复指明这些老生常谈。在瓦尔特·坎姆普斯基的《塔德尔略泽和沃尔夫公司》中出现了这样的疑问，它不仅使历史撰写疲惫不堪，而且使我们的文明的可靠性疲惫不堪——正如得以“额外”发生的那样，作为母亲的老生常谈。这部长篇小说表明，那种事物曾经能够作为纯粹的正常现象为人们所经历；在我们看来，这种事物想要而且必须显现为极端，还与所有正常的现象极端地决裂，用一句转变成原则性的话来说，人们依然能够经历这种事物，作为纯粹的正常现象。也恰恰因为如此，这在过去曾经是“可能的”，将来也会是“可能的”。我们还有必要说更多的话吗？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疑问如此顽固不化地保持不变？在21世纪初，人们出版过数以千页的关于这个疑问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那么，为什么这个疑问在此之后还要以其如此朴实无华的50年代的形象再次出现：“完全正常的家庭中为人父者怎么能干出这种事？”^①让我们先把这些令人惊讶的判断搁置在一边：艾希曼和赫斯都曾经是家庭中正常的为人父者。说出这种话的人究竟如何理解“完全正常的”？这些判断之所以令人感到惊讶，或许仅仅因为在此期间人们对此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家庭中为人父者采取什么态度才能被人接受。家庭不会保护成员，使之免遭任何伤害，这其实肯定接近一种正常的、合乎理性的结论。叔本华曾寻觅一种表达，用夸张的手法直观地表达人性之恶，这时他想到了这句话：一个人有能力杀死另一个人，旨在用另

^① 维尔策尔：《罪犯》(Täter)。

一个人的油脂把自己的皮靴擦亮。叔本华还补充道，这是否真的就是一种夸张，他对此表示怀疑^①。有了叔本华的这种认识，我们不一定非得列举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不可^②。虽然奥斯威辛是史无前例的——直到 20 世纪，德国人才得以纪念这座曾经发生过蓄意谋杀的城市，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特点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人类几个世纪以来曾经屡次犯下惨绝人寰的、让我们束手无策的丑恶行径。我们在书中频繁地读到，把婴儿的头往墙上撞，这是人的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还是对人类自己所做事情的一种习惯性的想象？人们试图说：二者兼而有之。茨威坦·托多洛夫^③引用占领军日志，里面谈到，人杀人，仅仅为了试验一下，看看他们刚用河里的鹅卵石打磨的宝剑是否还像他们所期望的那么锋利。^④“人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了解，他们刚杀死的人是谁。”^⑤而这些人在他们的膝盖上摇晃着（自己的）孩子，这是难以想象的吗？我们不难想象，可是我们知道，通过历史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严肃地认为，杀人犯回到家仍不会金盆洗手，甚至在家里还继续杀人。但是，举例来说，难道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回忆不会阻止他们去杀人吗？有时，某人实际上确实会偶然遇到这样一种心理联想^⑥，然而，这并非已经成了规则，而曾经要容忍离奇之事（fabula docet）。有时，恰恰对家中亲人的思念为谋杀提供了足够的动机。警察 101 预备营的头目

15

① 叔本华：“关于道德基础的征文竞赛”（Preisschrift über die Grundlage der Moral），第 14 条，第 554-555 页。

② 说明人性之恶。——译者注

③ 茨威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是法国批评家、符号学家。——译者注

④ 参见托多洛夫：《占领美洲》（*Die Eroberung Amerikas*），第 170-171 页。

⑤ 同上，第 175 页。

⑥ 参见维尔策尔：《罪犯》，第 184 页。

威廉·特拉普上校反正指出了这种可能性^①。20世纪为我们提供了用触目惊心的数字记载的案例,但是,对于这个虽然令人沮丧的、但又很遗憾地可信的看法来说,我们不需要20世纪的历史。

欧洲人曾经企图杀害在欧洲的全部犹太人,打死、击毙或者毒死人们捕获的单个的犹太人和小团体的犹太人。我们称这种企图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畸形怪物,这并不意味着,个别的参与谋杀者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实施灭绝种族的屠杀者与凯撒军团的兵痞没有什么区别,后者违背当时生效的国际法[这是一个有些年代排列错误的概念,尽管“氏族部落法”(ius gentium)恰恰就是这个意思],不折不扣地铲除乌塞皮特人和腾克泰勒尔各民族。他们不仅打死、溺死会使用武器的人,而且还偏偏打死、溺死妇女和儿童^②。类似的情况适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告发行为过去仅仅标志例外状态,例如,苏拉式的流放^③,或者一种被迷信彻底影响的社会的偏执狂的流毒。而这种告发行为不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才有,然而,在那儿告发行为以完全荒唐的规模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风格。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史无前例的并非告发行为本身,亦非想通过告发行为度过一生的告发者。史无前例的是一种营地体系,比如从德国开始、主要扩展到东欧的那个营地体系^④,史无前

① 布洛宁:《完全正常的男人》(*Ganz normale Männer*),第22页。

② 参见凯撒:《第四次高卢战争》(*Der gallische Krieg IV*),第68页;迈耶尔:《凯撒》(*Caesar*第338页;批评尖锐的霍斯特:《凯撒》(*Caesar*),第211-212页;关于国际法评价参见坎弗拉:《凯撒,民主的独裁者》(*Caesar, der demokratische Diktator*),第114-116页。

③ 达尔海姆:《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第28-30页。(苏拉,Sulla,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78年罗马政治家,他曾经驱逐、流放其对手,并且消除其决议。他经过长期斗争战胜对手,并于公元前82年至前79年作为独裁者进行统治。——译者注)

④ 作者在此指二战时纳粹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

例的是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古拉格体系——并非史无前例的是营地看守、例行公事的暴虐狂、折磨狂的类型，折磨狂随时行动出击，仿佛他干脆忘了，他残暴殴打的是人。“猫抓，狗咬，人杀人。”(Cats scratch, dogs bite, men kill)——鲁特·克吕格尔用这句简明表达的话向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认为，这不足为奇，也没什么可解释的。可是，16 坎姆普斯基的母亲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如此固执呢？

用家庭中为人父者的形式表达的“这怎么可能？”这个问句是非常有教益的，恰恰因为它如此明显地毫无任何意义。这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掩盖式记忆”^①这个设想的转变中涉及一个掩盖性的疑问：谋杀者怎么可能成为我们完全正常的父亲呢？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复杂，是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心理上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使我们在道义上面对（让我们坦率地说，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回答，无论如何）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疑问^②，尽管存在所有实际上的或者当事人凭记忆用一定文体风格记录下来的关于1968年大学生运动^③以及世纪之交的父辈和祖父辈的文献。但是，我们在此还应该再追问一遍：是什么使我们如此迷惑不解？因为，身为杀人犯的父亲都有儿女，但毫无疑问，在得知父亲的人生经历后，并非每个儿子或者女儿都显得如此困惑不解，以至于他们为此陷入毫不停歇的理论创造中。曾经被我称为“在心理上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具有一种绝对必要的前提：在两种道德之

① 意指病人力图忘掉涉及羞耻、自责、“精神痛苦”和实际上的伤痛等记忆，不愿回忆起创伤性情节的病人都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折磨。——译者注

② 参见雷姆茨玛：“罪责与责任”(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③ 即20世纪60年代在联邦德国境内发生的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原来旨在实行大学改革，后来，学生想超出此范畴实现政治与社会的变革。——译者注

间肯定存在一条道德裂缝，一种是证明这些行为合法的道德；还有一种是我们今天赖以评判这些行为的道德。在如下地方，并没有产生这样一种矛盾：幸好孙辈中的一小部分人适应了，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适应了，历史上“德意志帝国军队的荣耀与荣誉”的口号；而在如下地方，仅仅毫无例外地发生了类似的事情^①，正像在苏联之后相继形成的国家中大范围发生的那样：大规模的屠杀要么被视为“其他人”的行为（例如，从乌克兰角度看的俄罗斯人），要么被视为现代化以及获胜的卫国战争必要的伴随现象。对 20 世纪其他可怕的事件来说，重要的是，伴随着行为的合法证明，在行为之后，是否偏离轨道（看看广岛和长崎）。在德国，这种情况进行得特别彻底，纽伦堡审判^②对此是一种必要的前提，但随后的几十年，一直到人们围绕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关于德意志帝国军队罪行的展览进行的数年争论都表明^③，这并非充分的条

① 参见阿莱克桑达·提斯玛(Aleksandar Tišma)了不起的小说《居所》(*Die Wohnung*)。

② 纽伦堡审判(Die Nürnberger Prozesse, 英语为 Nürnberg trials)是 1945 年至 1946 年,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对作为首要战犯的前纳粹领导人进行的控告和审判。起诉书控告他们犯有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共同策划或者共谋罪。国际军事法庭由英、美、苏、法 4 国各派 1 名法官及 1 名预备法官组成, 经过 216 次开庭。在判决过程中, 法庭驳回了被告人提出的主要辩护: 第一、法庭驳回了只能指控国家而不能指控个人犯战争罪的论点; 法庭认为, 破坏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 只有惩治犯下这种罪行的个人, 国际法的规定才得以维护。第二、法庭驳回了所谓审讯和判决都是“咎既往”的论点。法庭认为, 这些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认定是犯罪的。——译者注

③ 主要参见汉堡社会研究所:《一次展览的参观者》(*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Besucher einer Ausstellung*); 汉堡社会研究所:《一次展览及其后果》(*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Eine Ausstellung und ihre Folgen*); 汉堡社会研究所:《战争是一种社会状况》(*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Krieg ist ein Gesellschaftszustand*)。

件。在 1945 年后的最初几年里，还是发生了同 1933 年至 1945 年时期的道德进行决裂的现象。文明的崩溃（在此，这个表达还非常幼稚地被使用）这些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评价以及应该根据获悉情况得出的结论，这些都一再证明自身是有争议的。人们想说：“只有……证明是有争议的”，根据这个历史的习俗：人们总把父母的谋杀行为理想化地看成英雄壮举。这也属于道德裂痕，即不接受这种“只有”的说法。

对“完全正常的男人”的谈论还指明了掩盖性疑问的另一个方面。“正常的”这个词发生了词义变化。“正常的”可以指：在心理上是正常的，他们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否则，在 1945 年后，他们还会自行负责地继续杀人^①。“正常的”还可以指：时代典型的平均状态，并非意识形态的狂热者，也没有通过宣传在精神上相应地被打造，单单由于年龄的原因，这就适合大多数谋杀者。但是，“正常的”还可以意味着：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这时，新教的简朴屈从了，并且对此表示同意。怀疑自己在所有卑劣无耻的名誉问题上道义方面的承载能力^②，但是，道德裂痕才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以及所有其他令人不安的问题，道德裂痕的事实其实应该使我们有必要坚持这个观点：他们在后者的意义上不是完全正常的男人，即，不同于你和我。对“正常”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的是，证实这一点并且坚持新的（或者重新获得的）标准。对“完全正常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等诸如此类疑问的回答于是就成了：因为判断“正常”的标准会发生变化移动。接下来的疑问是：这么快速，这么激进吗？

①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在小说《嫌疑》（*Der Verdacht*）中曾尝试指明这种荒唐的提法。

② 参见雷姆茨玛：《我本该采取什么态度？》（*Wie hätte ich mich verhalten?*）。

18 反问：我们指的是哪种激进，哪种加快呢？我们是指 1933 年后以及 1945 年后的激进和加快吗？我倾向于把后者看成更令人震惊的。而且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把后者视为更令人震惊的。

一场进行蹂躏达 30 年的战争，它从波希米亚内部一直到斯凯尔特河入海口，从波河两岸到波罗的海海滨，在很多国家屠城，践踏庄稼收成，把城市和村庄化为灰烬；这场战争使三十多万战士毁灭，这种毁灭使德国文化燎原的星火熄灭了半个世纪，而且把几乎还没有苏醒的、更好的风俗归还给了古老而野蛮的野性。^①

人们几乎等不及对 1914 年至 1945 年的第二场三十年战争^② 进行描述——第一场三十年战争也有中断间歇，而且，无论如何是区域性的，它在传统上被进一步划分为波希米亚与普法尔茨的战争、丹麦与下萨克森的战争、瑞典战争以及法国与瑞典的战争，注明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战场、数百万计死亡的士兵和平民、数百万计在集中营中被杀害者、数百万被驱逐者和逃亡者、对城市和各州进行的耸人听闻的破坏、数百万人已经对死亡和摧毁习以为常的人。难道这种描述也得汇入对或许持续时间更长的文化的和道德精神的一种衰败的证实中吗？特奥多·W. 阿多诺^③早在 1944 年就总结了这两场战争的相似性，而且把它们与

① 席勒：《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第 12 页。

② “第二场三十年战争”并非通用的学术术语，而是作者自创，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1914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1945 年共 31 年，所以作者有此说法。——译者注

③ 特奥多·维森格隆特·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是德国哲学家，精通社会学、心理学和乐理，因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贡献而著名。其晚期哲学研究集中分析知识分子运动。他以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而又强调个人，避开权力主义。著有《启蒙辩证法》等。——译者注

这种预言联系起来：

正如三十年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划分成不连续的、分成几个间歇的战役，即划分成波兰的、挪威的、法国的、俄罗斯的、突尼斯的战役，划分成入侵，当这场战争即将结束时，再也没有人能回忆起它的开端。战争的节奏、突击行动和完全停火的变换更迭……其节奏本身有些机械的特征，单个地描述了战争手段类型的特性……人生变成了不受时间限制的连续震惊，在这些震惊之间，窟窿、丧失活力的间隙发生爆裂。但是，对未来而言，或许再也没有什么比的确确实真的没有人再能想起战争更可怕的了，因为，归乡者的每一颗心灵承受的创伤，每个使人惊魂未定的震惊，都是未来解构的一种发酵酶。卡尔·克劳斯^①正确地称他的戏剧为《人类的末日》(*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今天发生的事情肯定叫 19
作“在世界毁灭之后”。……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在这场战争之后，生活会“正常地”继续，甚而至于，文化能够被“重建”——就仿佛重建文化本身并非对文化的否定一样。数百万犹太人已经惨遭杀戮，有人却说，这应该仅仅是个插曲而已，而非灾难本身。这种文化其实还在等待什么呢？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不会产生后果，受害人的数量不会突然转变成整个社会新的质变，残暴。即便等待时间留给无数人，人们能这样想象上述情况吗？只要一步一步地继续进行，那么灾难就成为永动的。人们只需想想为受害者进行的

^①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是奥地利犹太人，新闻工作者、批评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具有丰富的讽喻想象力与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其作品的文字偶有达到《圣经·启示录》那样撼人心魄的高度，例如，其1922年创作的长篇讽刺剧《人类的末日》，借助幻想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复仇。假如同样有许多人被其他人杀害,那么恐惧就不会变成机构,而血腥复仇的前资本主义的模式(该模式自很久以来仅在偏僻山区发挥支配作用),以扩大的方式再次被采纳,整个民族成为无主体的主体。倘若没有人为死者报仇,或者倘若没有人施恩,那么尽管一切没有遭到惩罚的法西斯主义都获得胜利,当法西斯主义一旦展示,事情多么轻而易举之后,法西斯主义就很容易在其他地方继续。^①

我们在托马斯·曼^②1945年5月4至5日的日记中可以发现:

凯旋中最狂野的残酷、在战败中的啜泣以及对慷慨和教养的呼吁。不,这不是伟大的民族。施佩尔^③在电台中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国家遭到如此摧毁。德国就像在三十年战争后一样……艾丽卡^④在读一篇为自由而撰写的文章,该文涉及对战犯的惩罚,而这种惩罚似乎像1918年那样,应该进行而未进行,只要俄罗斯人没有进行惩罚,以儆效尤。另一方面,不可能处决一百万人,而不

① 阿多诺:《道德底线》(Minima Moralia),第60-62页。

②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其早期三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威尼斯之死》和《魔山》使他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风格细腻,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体现人文关怀,语言充满机智、幽默和讽喻。——译者注

③ 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是德国纳粹,希特勒的主要建筑师、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他扩大了强制征召和强迫劳动制度,劳动力主要来自集中营,以维持纳粹德国战争物资的生产。服刑20年后于1966年获释,著有《第三帝国内幕》。——译者注

④ 艾丽卡·曼(Erika Mann,1905—1969)是托马斯·曼的女儿,作家,她先在慕尼黑后来在瑞士建立反纳粹的卡巴莱剧团“胡椒磨”。——译者注

效仿纳粹的方法。必须被消灭的有大约一百万人。^①

阿多诺和托马斯·曼两人都强调这种不可能性：对德国人的罪行做出恰到好处的反应。阿多诺把灾难的延续或升级的具体预料同这种不可能性联系起来。重要的是，要断定这里涉及预言，而不涉及评价。人们当然可以说，1945年以后，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状况曾是一场灾难，——但是，这或许是一种道德判断，而阿多诺并未谈及它。这种道德判断会和如下的状况联系起来：战后正常化使灾难几乎在各处都销声匿迹，以至于，尽管有一切历史编纂的兴趣和一切纪念日活动与纪念场所，人们仍然可以在毫不知悉大屠杀和死亡的情况下活着。针对在欧洲消灭所有犹太人这个企图，汉娜·阿伦特曾经说出如下名言：

这曾经是真正的震惊。事先人们说，人就是会有敌人。这可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事。一个民族为什么不应该有敌人呢？可是，后来事态就变了。仿佛深渊真正打开了缺口一样。因为，人们曾经以为，一切其他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再次重新恢复，就像在政治上可以使一切都得到重新修复一样。这次则不然。这永远都不该发生的。……发生了我们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应付的事件。^②

可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死亡都无法被“修复”，痛苦几乎也不会被修复。我们引用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Macbeth*)^③的话来说，任

① 托马斯·曼(Thomas Mann):《日记(1944年至1946年4月1日)》(*Tagebücher 1944—1.4.1946*),第198-199页。

② 阿伦特:《留下来的是什么?》(*Arendt, Was bleibt?*),第24页。

③ 又译《麦克白》(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卷),但译者在此处采纳朱生豪译本的译法。——译者注